



VI HORAE

董成龙 著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De Paideia Humanitatis Imperatoris Martis et Artibus Historicorum



VI HORAE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董成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董成龙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675-8503-4

I. ①武… II. ①董…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
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3894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著 者 董成龙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503-4/B · 1160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谨以此书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学记》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孟子·尽心上》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巨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刘小枫

moment[时刻]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标志，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用这个语词所标明的世界历史新阶段已经成为中国的经历，或者不易辨识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正在向我们抛出难以抵御的媚眼。毋宁说，古老中国的晚近150年历史清楚表明，新中国的崛起的确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 kairos[关键时刻]。

问题在于，对谁来说以及从何种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 kairos[关键时刻]？显然，对不同的智识人来说，即便共同撞上同一个 kairos[关键时刻]，其含义可能会完全不同。

董成龙博士称自己的这本小册子《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① 表面看来的确如

^①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92（以下随文注页码）。

此,但读者恐怕很难把此书仅仅视为一篇读书报告。毕竟,作者在题为“引言:阅读司马迁”的第一章结尾时如是说:

草此小书,以汉朝的立朝与立教为线索,贯通《史记》的叙事和司马迁的关切;重整这一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为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问题聊备一说亦未可知。(页19)

很清楚,作者在今天读《史记》意在因应“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可是,在上面这段表述中,“立朝和立教”作为问题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有“汉朝的”界定,第二次没有。按具有世界历史视野和历史哲学眼力的政治思想史大家沃格林(1901—1985)的说法,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时代同样堪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① 成龙博士究竟要“思考”哪个时代的“立朝和立教”,显得刻意含糊其辞。在上引那段话之前,作者还说:

司马迁生逢立朝 60 余年,国朝业已展开关于德性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最终于汉武帝时期形成有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德性的定位,从而规范了汉朝以后的国朝道路,这一道路甚至成为以后中国历朝“超稳定结

^① 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页372(以下随文注页码)。

构”的规范之一。(页18)

在整篇“读书报告”中,此类修辞或语式不时可见。^①很明显,作者刻意将相隔两千多年的两个世界历史时空中的中国时刻叠合起来,以便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今我们身处的历史时刻与武帝—司马迁的历史时刻有怎样的政治思想史关联。

人们难免会问:世界历史上的古今两个中国时刻可以叠合起来思考吗?这样的疑问其实来自作者自己,因为他在开篇就说:自“泰西政教澎湃东来,华夏大地与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不期而遇”之后,“摆在时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该如何走出中世纪”(页1)。既然如此,若把世界历史中的两个中国时刻叠合起来看,那么,作者希望今天的我们关切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作者通过体味《史记》书法并追索司马迁的心法,并非仅仅呈现了自己的深切思考。毋宁说,作者把司马迁请回当代,敦促我们反省自己含混的历史意识,缕清自己赖以理解眼下身处的古今之变的政治觉悟。

一 立教时刻与政治史学意识

“立教时刻”是本书的首要关键词,就字面含义而言,它

^① 比较页18—19,页26—27,页44—46,页54,页137—138。

指的是汉武帝形塑中华帝国的那个历史时刻。由于我们的历史时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该如何走出中世纪”，汉武帝所形塑的中华帝国形态就是我们应该走出的历史形态。倘若如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理解或评价历史上划时代的华夏君王。^①

在我国传统帝王谱系中，汉武帝早有“雄才大略”、承“三代之风”（班固语）的美誉。毛泽东的光辉词作《沁园春·雪》具有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武帝在他笔下仅仅是“略输文采”，其武功至伟毋庸置疑。但是，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武帝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罪人：他“独尊儒术”，使得中国式“君主专制”政体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罪莫大焉。在现代中国的世界历史时刻，武帝一度成了史家笔下的鞭尸对象，甚至其赫赫武功也遭贬低。据说，专制君主的种种毛病在他身上已经显露无遗。^②

史家贬低汉武，并非现代才有的事情。宋代大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乎与暴虐的秦始皇相差无几。今天的我们没想到，若干年前，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当今史学界名家辛德勇

① 比较页 21 和页 102，作者在那里提到 20 世纪中国的两件重大政治实事。

② 吕思勉，《中国的历史》（1920），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页 72—74。

教授出版了名为《制造汉武帝》的小册子,“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①

此事的起因是,曾有某位德高望重的古史学家凭靠《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武帝晚年临逝前曾经转变治国理念,不再“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并下诏“罪己”。在晚近的标准国史大纲中可以看到,这事似乎成了武帝应当享有历史美名的证据。^② 经过现代启蒙洗礼的我们难免心生疑窦:天底下真有这样了不起的君王?

德勇教授以令人赞叹的考证功夫让我们看到,下诏“罪己”这件事纯属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的编造。不过,志在澄清史事的德勇教授颇有分寸地告诉读者,他的考证结果至多“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制造汉武帝》,页2)。

如今的大学生恐怕不会像史学名家那样有分寸感,他们也不知道司马光罗织的武帝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是否同样“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难免会因此对司马光这样的历史思想家留下负面印象。这位大政治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竟然随心所欲编造史事,令人不齿。按现代的政治觉悟

①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北京:三联书店,2015,页1(以下随文注页码)。

② 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页58。

或历史意识,这类政治目的不外乎是为专制服务。大学生们一般没谁会进一步去想,为何司马光明知武帝一生“穷奢极欲,繁刑重斂”,还要编造他临终前下诏“罪己”的事儿。

武帝治国“繁刑重斂”,似乎崇尚法术,而晚年下诏“罪己”,又显得深谙儒术。据说,公元前136年,武帝在宫廷设立了五经博士,10多年后又指定50名太学生跟从五经博士修习儒术,无异于“创办了一所国立大学”。据此,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名家费正清说:

汉武帝差不多像秦始皇一样是个完全信奉法家的君主,可是人们一般认为,在他统治时期,儒学成为了中国宫廷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①

言下之意,武帝表面上致力于建构儒家意识形态,骨子里却施行法家式的统治。当今古史学家的说法没谁会凭空捏造,个个言有所本。《史记》的写作年代最接近武帝的时代,想必是当今古史学家凭靠的第一手史料。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我国古代的史家讲究“书法”。《制造汉武帝》最后一章以民国初期学人李笠的《史记补订》起笔,按这位史学家的眼力所见,《史记》书法可归纳为12条通例。其中一例为

^①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页71,比较页72—73。

“段托”，意即“史贵详实，然亦有意主形夸，词务奇譎者，不可以循名而责实也”（《制造汉武帝》，页159）。

德勇教授由此引出一件史实：汉武帝从未独尊儒术，其治国理念实为“以霸王道杂之”。“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德勇教授还让我们看到，只要史家志在搞清史实，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从明代至今，都不乏这样的史家眼力（《制造汉武帝》，页171—172）。

武帝崇尚儒术，见于好些中外古史学家撰写的中国通史。大名鼎鼎的内藤湖南（1866—1934）说：“文景是黄老之学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则非常喜好儒学”。^①现在我们得知，即便是名家的说法也未必可信。不过，无论武帝是否真的推崇儒术，后世的史家似乎一致认为，崇尚儒术等于好政治（德政），崇尚法术等于坏政治（酷政）。

当然，按新文化运动的观点，“独尊儒术”也是坏政治，几乎与“专制”是同义词，这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好政治。历史已翻过新文化运动这一页，广义上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至少在名义上已恢复了名誉。那个古老的问题再度出现，即如何理解汉初立朝和立教所经历的从黄老之术治国到儒术

①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页170；比较蔡美彪，《中华史纲》，前揭，页50；伊佩霞（P. B. Ebrey），《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页44。

治国的转移。《道德经》由“道”引出“德”，韩非子讲法术或君王术本于“解老”和“喻老”，何以崇尚法术就不是“德”政？

这个问题让人挠头，但作者的“读书报告”仅用了一章篇幅（第四章）来处理。作者关切的核心问题是：“汉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司马迁对此颇有微词”（页14）。言下之意，司马迁已经看出，武帝崇儒不是真的。“读书报告”最后一章临近结尾时，作者眼里的司马迁对武帝的立教已经不是“颇有微词”，而是重笔挞伐：

汉武帝立教改制，远不能重光黄帝（五德说），中不能复返周文（三统说），唯取近道，使秦时政法易名重现。司马迁痛心疾首的正在于汉武帝的立教事业，原本应当改制，然而不过以改制之名将秦制坐实为汉朝家法，使汉朝一方面不必再纠缠于汉承秦制与代汉而起的新朝论证，另一方面又实际延续了秦制。汉武帝虽有推行“复古更化”之名（《盐铁论·复古》），却既未“任德教”，更没有“复古”。（页168）

看来，作者的观点与《制造汉武帝》的说法似乎并无不同。因为，作者笔下的司马迁认为，武帝仅仅表面上装得来致力扭转其先王以法术治国的60年传统，实际上他比其先辈更为彻底地回到了“繁刑重敛”的秦代。作者紧接着就说：